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 D C \_\_\_\_\_

# 学位论文

## 上古音谐声研究：

谐声谱、谐声理论和古韵再分部的讨论

(题名和副题名)

贺福凌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职务、职称、学位、单位名称及地址 鲁国尧 教授

文学硕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申请学位级别 博士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4 年 4 月 22 日 论文答辩日期 2004 年 5 月 17 日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南京大学 2004 年 6 月 15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董志翹

评阅人: 唐作藩

耿振生

董志翹

马景仑

李开

2004 年 4 月 22 日

#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文摘要首页用纸

毕业论文题目：上古音谐声研究：  
谐声谱、谐声理论和古韵再分部的讨论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2001 级博士生：贺福凌  
指导教师：鲁国尧 教授

## 中文摘要

谐声研究是上古音研究的一部分，它既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又和上古音研究的一切方面密不可分。本文以谐声研究为切入点，对上古音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述，本文的主旨在于考镜源流，别白得失，提出问题，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划定区域和指明方向。

本文简要回顾了宋代吴棫以来上古音和谐声研究的历史，从谐声的角度勾勒出古音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本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承继关系和内在规律。

谐声谱是谐声分析的前提条件，本文搜罗了大量谐声谱，比较了它们的异同，指出其中形声字的判定和古韵归字还有不少问题。作者把归字的标准严格限制在《诗经》用韵范围，对于归字的困难，建议暂时放弃对系统性的追求，而代之以对上古汉语单字音的考证。

谐声原则就是对上古谐声字语音相似程度的推测和解释，谐声字之间并不严格同音，用形态解释近音谐声证据不足。谐声分析是内部拟测法，应遵循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则，讲究分化条件和音变规则。

古韵再分部普遍从音理推阐出发，以谐声为主要依据。白一平、郑张尚芳等对古韵的再分部得不到《诗经》用韵的支持；谐声字中开合不互谐，但具体结论和最终解释还有待研究，本文基本不赞成在王力 30 部基础上的一切再分部提议。

本文最后提倡应加强上古音和諧声字地域和历史层次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成果以单字音考证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上古音 谐声研究 谐声谱 再分部 单字音研究

#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生论文英文摘要首页用纸

THESIS: A Study on Xiesheng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Xiesheng Family、Xiesheng Theory and the Further Rhyme Category

SPECIALIATI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Graphics

POSTGRADUATE: He Fu-ling

MENTOR: Professor Lu Guo-yao

## ABSTRACT

The study of Xieshe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 review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of Xiesheng. It is a preparation for more extensive studies.

The author's main points are below:

1. The development of Xiesheng study has its own law . Chen Di ,Wu Yu, Gu Yanwu have maken their own achievements. Duan Yucai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contributor in the histor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2. After Duan Yucai, a lot of Xiesheng families appear ,the author collects them as many as possible .Having maken a comparis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ny phonetic compounds characters and the pronunciations of quite a few words in Old Chinese are still in question.
3. The principles of Xiesheng just ar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similarity.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y,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theoretical pattern of Xiesheng analysis.
4. The present rhyme categor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could not be divided easily. Some scholars have maken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hyme categories , but in view of the lacks of Shijing rhymes and Xiesheng data the further rhyme categories in Old Chinese are not acceptable.
5. It is suggested to resolve the present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Xiesheng by investigat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single word.

Thi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study of Xiesheng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

**Key Words:** Old Chinese phonology    the study of Xiesheng    the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single word (SPSW)    Xiesheng family    further rhyme categories

# 目 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绪言.....	1
<b>第一章 谐声研究的历史回顾.....</b>	<b>2</b>
第一节 古音学的创始和谐声理论的萌芽.....	2
第二节 古音学的发展和“同谐声必同部”理论的提出.....	6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现代转型和谐声分析的理论推进.....	11
 <b>第二章 谐声谱诸问题.....</b>	 16
第一节 谐声谱的种类和体制.....	16
第二节 形声字的判定.....	19
第三节 归字的原则和实践.....	24
 <b>第三章 谐声理论.....</b>	 30
第一节 形声字的音近度和谐声原则.....	30
第二节 谐声分析的理论模型.....	36
 <b>第四章 古韵再分部的讨论.....</b>	 45
第一节 古韵再分部的提出.....	45
第二节 古韵再分部的理论背景.....	51
第三节 古韵再分部的文献取证.....	59
结论：提倡单字音研究.....	68
参考文献.....	72

## 绪 言

国学大师黄侃云：“治学之道，发见一，推明二，改善三，钩沉四，扶微五，闡合六。”<sup>①</sup>研究学问，贵在有所发明创造，但是发明创造不容易。如果能汇集众说，折衷其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明辨源流，审度得失，则亦不失为治学之一途，这就是黄侃所说的“推明、改善、钩沉、扶微”的意思。

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由宋代以来已历数百年，其间硕儒大师辈出，但是其基本材料不外是《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观念和方法虽然代有不同，具体结论却是代代相因累积而成。从音类分析到音值拟订，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各不下十数家，当今的上古音研究，创新的空间已经很小。只有古汉字的谐声系统，因为不断有新的古文字材料出土，旧的材料又还有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故而存在相当的研究余地。尤可注意的是，《说文》的谐声系统决非作之于一时一地，以之研究上古音必须考虑其异质性。魏建功（1934：34）就说：“得将谐声字发生的时代给划定，不能先后笼统混合。”前贤大多明白这一点，可没有哪一位真正做到了。本文暂不对上古音的谐声系统作全面的考察，我们认为在这项研究展开之前，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较为深入的史的评述，是一个较适宜的选择。清人皮锡瑞在其名著《经学历史》中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本文选题的旨趣即在于考辨源流，别白得失，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划定区域和指明方向。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

- 1、上古音研究的经典文献；
- 2、虽非经典而与论题相关的人物、学说。

本文评判的标准是：

- 1、尊重基本的语言事实：《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
- 2、尊重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则：音变规律无例外，在相同的条件下音变的结果可以预见。

<sup>①</sup> 《量守庐论学札记》，王庆元整理，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第一章 谐声研究的历史回顾

## 第一节 古音学的创始和谐声理论的萌芽

古音指的是上古周秦两汉的语音系统，古音学是中国古代的历史音韵学。在音韵学的几个分支（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北音学）中，古音学是最早形成而特别发达的一个分支。<sup>①</sup>古音学的发生导源于先秦典籍的释读，由于古今音异的原因，常使学者们在读典籍时产生疑问。而这种情况早在东汉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因为东汉和先秦典籍所代表的语音时期已大不相同，这反映在经师们的注经活动当中。经过六朝隋唐的探索，至宋代终于正式形成了古音研究的局面。由于这种历史音韵研究一开始就直接面对的是文字书写的书面材料，所以音韵研究和文字研究从来就不是完全分离的。经过长期的磨合研究，人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汉字当中的语音事实，那就是形声字的声旁反映着古代的语音系统。这个发现的成熟表述之一是“同谐声者必同部”，也就是说属同一谐声偏旁的字在上古韵文当中押同一韵部。它的发现者是清代的古音学家段玉裁，然而我们知道，学术史上的任何创新和发明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深究起来，会有各种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如果我们沿着古音学的发展轨迹，从吴棫、陈第一直到顾炎武、段玉裁看下来，会发现古音研究从草创到粗具规模，而谐声研究似乎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

真正的古音研究始于北宋，吴棫的《韵补》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古音学著作。吴棫，字才老，福建武夷人，宣和六年进士。吴棫别有《书裨传》、《毛诗补音》、《论语指掌续解考异》、《楚辞释音》诸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其中《毛诗补音》为朱熹《诗集传》叶音所据，又被广为征引，在吴棫诸书中最为重要。徐陵《韵补》序不谈《韵补》本书，却两次提到《补音》，一次说：“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谣谚之类莫不字顺音叶。”这是褒奖《补音》的成就，另一次说：“《补音》引证初甚博，才老惧其繁重不能行远，于是稍削去，独于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一二条，其间或略远而举近，非

<sup>①</sup> 北音学兴起于现代，而隋陆法言创制《切韵》以及宋元等韵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方言学、语音学，而并非探讨语音历史变迁的音韵学。

有所不知也。”这谈的是《补音》的论证方法。从这一点看，《补音》和《韵补》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援引古代文献材料以证三百篇的用韵，而《韵补》只是把这种考证按照韵书的体制作一汇编，再据古人用韵以推 206 韵的分合，可以说后来的古音研究是在《韵补》的基础上前进的，因此被目为古音学的开山之作。此书在明清之际不太常见，顾炎武起初也没有看到，直到《唐韵正》完成才从友人处得见此书。顾炎武对吴棫评价很高，他说“念考古之功实始于宋吴才老”，又说“才老可谓信而好古者矣，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引用别为次第而已，今世盛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顾炎武《韵补正》序）充分肯定了吴棫的创始之功。吴棫在《韵补》中已懂得利用文字谐声以证古音。如：

#### 卷一五支

哀，於希切，悲也，《说文》衣声。《尔雅》：哀哀，怀报德也，裴瑜读。宋玉《九辨》：覩杪秋之遙夜兮，心緇惄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

#### 卷一十七真

颠，典因切，顶也。《说文》以真得声。司马相如《上林赋》：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矫枝格，偃蹇杪颠。

#### 卷三四纸

怠，慢也。《说文》台声。《左氏传》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久，苟起切。

殆，危也。《说文》台声。屈原《天问》：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以上“哀颠怠殆”诸字古音和《广韵》不合，吴棫除用古代诗文用韵等材料证明诸字当别收他韵之外，还发现这些字的声旁恰在这些韵当中。这是由声旁以推形声字的古音，当然反过来，如果在一组谐声字中，被谐字的音不变而谐声声旁的音变了，也可根据被谐字的读音推证声旁的读音。如：

#### 卷二七歌

皮，蒲波切，肤也。《说文》波波颇跛皆以皮得声。《仪礼》：君射则皮树中。今文皮作繁，皆婆音。左氏华元谓役者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者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

这一例说皮字虽则在支韵，而从皮得声的波颇跛颇等字皆在歌韵，那么皮也应属歌韵。

又如卷一一东

雙，疏工切，偶也。后汉语天下无双、殿中无双、江夏无双皆此读。《左氏传》：駢氏𡇔，息拱切，以雙得声，或读所江切，非。

不过据我们的调查，《韵补》对《说文》谐声的使用并不是严格的、一贯的以至于形成一定的条例，也就是说通过文字谐声以证古音在《韵补》中不是很重要，谐声只是一个次要证据。《韵补》前列举了五十种参考书籍，大部分是历代有韵的典籍、文集，另外有小学类的刘熙《释名》、史游的《急就章》，他还提到郭璞的《山海经赞》，并说：“晋之字学，郭璞最深”，独没有列入最重要的字学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又如上平一东考证了 55 个字，用《说文》谐声为证的是 2 个字，用释名声训为证的是 6 个字。

### 《说文》

- 1、窻，《说文》忽声。  
2、𡇔，息拱切，以雙得声。

### 《释名》

- 1、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2、杠，公也。众人所公共也。  
3、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  
4、甍，屋脊曰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  
5、窻，聪也，于内窥外以为聪也。  
6、陵，隆也。

又卷三四纸考证 80 个字归入此类，其中用《释名》声训为证 10 个字，提到《说文》 14 字，11 个字用谐声为证，1 个字用《说文》读如，2 字用《说文》声训。

### 《说文》

- 1、攷，许慎读如芑。  
2、攴，《说文》攴，已声，读若已。  
3、宰，《说文》从梓省声，又云或不省作梓。  
4、死，《说文》死，澌也。  
5、醢，《说文》盍声，许慎读盍如贿。  
6、火，《说文》燬也。  
7、𠂇，《说文》从人以声。  
8、怠，《说文》台声。  
9、殆，《说文》台声。  
10、祀，《说文》从示已声。  
11、耜，《说文》从以声。

### 《释名》

- 1、姊，积也。  
2、癥，徙也。  
3、事，傳也。  
4、首，始也。  
5、海，晦也。  
6、火，燬也。  
7、祸，毀也。  
8、汜，已也。  
9、负，背也。  
10、祀，已也。

12. 俟，《说文》矣声。

13. 埂，《说文》矣声。

14. 马矣，《说文》矣声。

从我们抽样统计看，《韵补》在运用谐声和声训的次数上相差不大，但是考虑到《释名》的收字远远少于《说文》，而且《释名》在小学类著作中的地位也较《说文》为低，说明吴棫并未充分认识到《说文》谐声的价值。有时候很明显的证据，如“江杠”两个字，《说文》都从“工”声，可据此归入东类，而《韵补》于此两引《释名》，却不援引《说文》。

吴棫谐声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把同一声系的字分置两处。如同一“我”声系，“義議峩峨我”收入五支，然而七歌又收“儀義議”三字，其中“義議”两个字两收。同一皮声系，五支收入“波”，七歌收入“皮披”。我们看吴棫对“議”字的讨论：

#### 卷一五支

議，謀也。颜师古《纠谬正俗》：或问議誼二字今人读为宜音，得以通否？答曰：《书》云无偏无陂，遵王之谊，《诗》云或出入讽議，或靡事不为，故知亦有宜音。

#### 卷二七歌

議，謀也。《史记叙传》：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周侵禾，王人是議。

吴棫的推理程序是：

$$\text{今音} \frac{\text{議叶为(支)}}{\text{議叶禾(歌)}} \Rightarrow \text{古音：議有歌支两读}$$

吴棫根据“議”字和今韵歌、支两押而推论“議”有歌支两读，以至后人批评他“字无定音”，“随意通叶”。说他“随意通叶”是不对的，因为他是很重视证据的。造成其“字无定音”的原因，是他缺乏彻底的古音观念。他的书叫《诗补音》、《韵补》，补者，大体已具，补其未备也。也就是说诗音、《广韵》基本上是对的，只是有些字音没收，古代诗文的一些押韵用现有的韵书的韵部解释不了，所以要将这些字音补充进来。吴棫所引证的材料从《尚书》、《诗经》到欧阳修、苏轼，时代相隔两千年，也说明他本意并非要推翻今韵，重构一个古音系统，而只是想作一本韵书能尽量解释历史上所有押韵现象。至于他这种做法的客观效果，如一定程度地展示了古音的面貌，应该不是他最直接的目的。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徐陵《韵补序》中著名的一段话：

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谣谚之类莫不字顺音

叶，而腐儒之言曰补音所据多出于诗后，殆后人因《诗》以为韵，不当以是韵《诗》也。殊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霍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洧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麋切而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为房六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为蒲北切而无与房六叶者；友之为云九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一，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与云九叶者，以是类推之，虽毋以它书为证可也，腐儒尚安用哓哓为。

这段话是徐陵反击“腐儒”对《补音》的批评的，在我们看来，“腐儒”的言论倒是比较正确的，用苏轼、欧阳修的诗韵去证《诗经》的用韵当然不行。但是这段话提出了两种重要的古音研究方法：文字谐声和《诗经》韵字的归纳统计。后来的古音学就是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的，只是更加详密完备而已。这一段话很富有理论色彩，他说“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是了不起的发现。只是这段话针对《补音》而言，《韵补》里完全没有这些内容，这使我们猜想吴棫的《诗补音》可能有更精彩的关于谐声和古音的论述。

## 第二节 古音学的发展和“同谐声必同部”理论的提出

严式海《音韵学丛书·初编·目录》云：“吴才老、陈季立两家书，言古音者大辂之椎轮也。”继吴棫之后对古音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明代的陈第，陈第（1541-1671），字季立，号一斋，万历时诸生，曾任蓟镇游击将军，致仕归。他的朋友焦竑说他“贯串驰骋，著书满家”（《毛诗古音考》序），其所著书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旨都在探讨古音。陈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古音观念的更新，上文我们说到汉代已经有古今音异的认识，可是终不免是个别的、零星的印象式的讨论，至吴棫开始成规模地搜罗古代的音读，然而他不肯放弃今韵的框架。陈第看到了语音随时间、地域而变迁的基本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他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自序）“故读六朝必考六朝之音。由此而上可知也。不然同乎我者谓声之谐，异乎我者谓韵之叶，以一地概四方，以一时概千古，将使文字声律涣判支离而靡有划一，岂所贵于诵读哉。”（《读诗拙言》）陈第把这个发现看得很重，认为是“千载一遇”的盛事，他还自信地说：“使见者以为是也，古音自此可明；谓未尽也，触类引伸必自是始；谓非也，则以待后世子云而已。”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云：“有明一代蔑弃古学，讹谬相循，沈潜遗

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这话若论全部学术，未免夸大，若论古音，则陈第的发现确如破空嚆矢，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陈氏《毛诗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义》三卷，如果说有超越吴棫的地方，就在于他贯彻了自己的古音观念，将吴棫所创的考证方法科学化精密化了。吴棫《韵补》取材漫无定准，陈第把文献证据分为本证和旁证，本证是三百篇的自相证明，旁证采自先秦汉魏六朝用韵之文。对于旁证，他也有采摭的标准，他说：“愚编旁证采《易》独详，以时世近而声音同也。”对于汉魏以后之音，他说：“自周至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也就是审慎选择汉魏以后合于古的材料，总之是“尚论当世之音而已矣”。

陈第对谐声理论的贡献是他明确提出《说文》之谐声“多与《毛诗》合者”，因而大大提高了《说文》在古音考证当中的地位。他说：

《说文》讼以公得声，福以偏得声，霍以狸，斯以其，脱以兑，節以即，溱臻皆秦，闔填皆真，者读旅，渙读矣，滔读由，攷读艺；又我读俄也，故义有俄音而因之得声矣，且以羲娥鵠𩫑𩫑之类例之，我可读平也奚疑乎？可读阿也。故奇有阿音而猗倚因之得声矣，且以何河柯柯珂珂苛诃之类例之，可可读平也，亦奚疑乎？凡此皆《毛诗》音也，徐铉修《说文》概依孙愐之《切韵》，是以唐音而反律古矣，厥后诸韵书引古诗如晨星而于唐宋名家之辞每数数焉，无亦谱子孙而忘宗祖乎？嗟夫！《说文》之音多与时违，几为沟中之断矣，愚独取之以读《诗》，岂偶也哉！岂偶也哉！（《读诗拙言》）

陈第这里讨论了“我”和“可”两个谐声系列，根据“我”和“可”的一大批被谐字读平声而推证“我”和“可”可读平声。最重要的是他取《说文》以读《诗》的说法，上古音研究的两块重要柱石，《说文》谐声和《诗经》用韵已经逐渐呈现并紧密联系起来。陈第引《说文》往往不是“从某某声”这样单纯，而常常略加论述或点评，照他的说法，是“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如：

卷四江，音工。《周礼》六书三曰谐声，江河是也；《释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风俗通》：江者，贡也，出珍物可贡献也。《说文》以工得声，后世之音云谐声远矣。

卷三急，音以。愚按：《说文》从心台声，台从口以声，古音所以易简也。

陈第强调谐声的作用。又如：

卷四逝，音折。《说文》从辵折声，读若誓。誓又云从言折声，此古音也，何待叶乎。

卷三驰，音驼。愚按：《说文》驰从马也声，驰从贝也声，盖也古音移，与它通，故蛇从它，亦从也，池从也，亦从它。

陈第论证驰音驼，实际上是通过重文论证了也声系和它声系的通借关系。

陈第对谐声的认识无疑比吴棫前进了许多，他反对字有叶音，主张古音自有定准，就不会把同谐声的字分开来。但是陈第的局限是没有考定古音的系统，而只是从单字读音的考订上阐发他的古音观念，所以有关谐声的更深的内涵他并没有揭示出来，接下来的工作是顾炎武完成的。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其所著《音学五书》，《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两卷，总为三十八卷，是所有古韵家中，卷帙最浩繁的一部著作。顾炎武对这部著作期望很高，屡次修订而不肯轻易付梓，直到晚年才鬻产刻书，刻成后又“藏板名山”，“惧末俗儇恶好改窜人书以自贾衒”也。《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三百年古音学的基础，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顾炎武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性地研究古音，他打破《广韵》固有的格局，分古音为十部，从而第一次科学地构建了古音的系统。他在《答李子德书》中说：

夫子有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蒐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自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故吾之书一循《广韵》之次第而不敢辄更，亦犹古人之意。

顾炎武说到的就是由《广韵》而上推古音：

平水韵（俗音） $\Rightarrow$  广韵（齐梁音） $\Rightarrow$  五经三代之古音

这种观念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吴棫的通转是在今韵框架内的通转，他之分《广韵》为九类和顾炎武古音十部的《古音表》不能相提并论。顾炎武对谐声理论的发展是和他古音学的成就相匹配的，他能成功地离析《广韵》，依靠的就是文字的谐声关系。顾氏对谐声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唐韵正》中，《唐韵正》是顾氏《音学五书》最着意的部分，顾氏分古音十部，其中支尤麻庚四韵各分为二。

卷二五支“衰”字下曰：以上字当与六脂七之通为一韵。凡从支从氏从是从𠂔从此从卑从𠂔从尔从积从危之属皆入此。“麌”字下曰“以上字当与七歌八戈通为一韵。凡从多从为从麻从垂从皮从脣从奇从羲从罷从离从也从差从丽之属皆入此。他根据谐声偏旁把支韵分为第二部支和第六部歌。

又如卷四九麻“髽”字下曰：以上字当与七歌八戈通为一韵，凡从麻从差从𠂔从加从沙从坐从过之属皆入此。“苴”字下曰：以上字当与九鱼十虞十一模通

为一韵，凡从著从余从邪从华从夸从假从且从巴从牙从吾之属皆入此。顾氏根据谐声旁把麻韵分为第三部鱼和第六部歌。《古音表》第二列入支韵一部分字。其后说：“凡所不载者即案文字偏旁以类求之。”推测他的意思，这句话是适用于各部的。第四部二十文“收入微韵燁暉燁鞞字”，二十一殷“收入微韵旂圻旂𠵼字”，就是这句话的体现。顾炎武其实已接近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边缘。但终归仍处于古韵分部的草创时期，相对于提出完整的谐声理论来说，能够离开《广韵》而建构古音系统显得更为重要。学术的发展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遵循一定的节奏和步调，当古音学的发展步入他的高峰时，汉字中的谐声规律终会呈现出来。

清代古音学的高峰是段玉裁带来的。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段玉裁的主要音韵学著作是《六书音均表》以及《经韵楼集》中一些单篇书信、序跋，如《答江晋三论韵书》、《声类表序》等。此外，《说文解字注》一一考订每一个字的上古音读，如果将其论音的部分摘出单行，那也是一篇幅厚重、包罗宏大的古音学著作。

《六书音均表》篇幅并不大，然而创获极多，而且几乎每一项都是独一无二的发明。如：

- 1、支脂之三分，真文分立，幽侯分立；
- 2、古本音，今变音说；
- 3、古合韵及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说；
- 4、古谐声说；
- 5、古无去声说等等。

这些发现都是前人所未言而后人不得不参考的重要学说。古音学至段玉裁有两件重要的任务得以完成，一是古音学学科本身的基本架构的建立，一是上古音韵部系统的基本格局的建立。段玉裁分古韵为 17 部，比顾炎武多 7 部，比江永多 4 部，可是并不只是量的简单增加，段氏的支脂之三分、真文分部、幽侯分部具有质的飞跃，可以说段玉裁完成了古韵分部里最困难的部分，后来王念孙，江有诰虽然分部更加精密，在贡献上仍然不能超越段玉裁。上古汉语音韵研究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的是理论、方法，上古音的基本证据和基本架构仍然没变，而这个基本架构是由段玉裁完成的。吴棫和陈第首先研究了三百篇的用韵，顾炎武第一次离析《广韵》以推求上古音，段玉裁发现了形声字的规律，创立了

“同谐声必同部”的理论。这两点是段玉裁最重要的贡献。

段玉裁为什么能创立“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通过我们对吴棫、陈第、顾炎武的一番讨论应该明确起来，那就是前人已经作了很好的铺垫和积蓄，打好了基础。

就段玉裁自身来说，他是一个最善于总结前人、推陈出新的学者，在古音学史上，段玉裁是一个理论大师。一般认为，段玉裁的等韵学不精，于审音一途比较疏略。他的老师戴震、后辈夏炘、当代的语言学史专家何九盈都是这么认为，因为他连双声这样的事都经常搞错，<sup>①</sup>可见普通语音学的知识比较差。但也许正因为技术层面的短缺，使他在另一方面，理论的概括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别突出。段玉裁提出某观点往往用“某某说”作为标题，《今韵古分十七部表》提出了 22 个“说”，《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提出了 13 个“说”，当然其中一部分并非段氏原创，如“第六部独用说”（按：蒸部），“第十部独用说”（按：阳部）等，这些成说，段氏往往加上“古独用无异辞”，表示并非自创，而做的是一个清理汇总工作。有些观点前人也说过，段氏说得更明白、更直接，如：音韵随时代变迁说，古音韵至谐说等，陈第、顾炎武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这样的思想，经段玉裁这一表述，就成了纲领性的论断，这在学术上已经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剩下的各种“说”，则完全是段玉裁当享有专利权的独家发明，如古合韵说、古谐声说等。

近年来学术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的发明权上不免会有一些新的争论。<sup>②</sup>张民权（2002 下册：199）指出，“同谐声必同部”的做法，在段氏 50 年前的潘咸已尝试过。不过我们觉得在谐声理论这一点上，段玉裁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他不只是提出一个观点这样简单，围绕这个观点的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和“古谐声说”一起提出来的是系列学说：

- 1、古谐声说；
- 2、古假借必同部说；
- 3、古转注同部说；

<sup>①</sup> 何九盈（1993）指出，段氏等韵不精，而好谈双声，有同类双声，同纽双声，位同双声，谐声双声等，其中谬误不少。

<sup>②</sup> 如脂微分部（何九盈 2000：268）为曾运乾首创说。

#### 4、六书说。

可见段玉裁分别考察了形声字、通假异文材料、声训材料等所有古汉字的音韵行为而提出了一个“同部而相通转”的系列。段氏同时看到了他的理论中的例外情况，又提出了一个“分部互用”系列：

- 1、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
- 2、古一字异体说；
- 3、古异部假借转注说。

而支持他“分部互用”系列理论的是：

- 1、古合韵说；
- 2、古合韵次第近远说。

而合韵说又是和段氏《诗经》用韵研究、韵部的区划等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谐声理论是段玉裁古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质量的理论体系。在处理规则和例外方面，尤其体现段氏的思辩能力，这一点恐怕是别的人不能企及的。段氏谐声理论发明的伟大意义，段玉裁自己的一番话说得很清楚：

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变、平入之相配、四声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六书音韵表》）

《诗经》韵脚才一千多字，段氏“同谐声必同部”的发现使古音研究的取材范围扩大了，论证效能加强了。谐声系统本身更有自己的复杂情况和问题，这样使古音研究不断有新的课题和进展，从宋代以来，汉语上古音韵研究到今天仍然呈现热闹非凡的局面，这其中不能不说有段氏谐声理论的一大功劳。段玉裁自然不能预见后来古音学和谐声理论发展的具体情况，但他显然清楚这“埋蕴千年，一旦轩露”的学术发现会有长久而新鲜的生命力。

###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现代转型和諧声分析的理论推进

段玉裁以后古音学的发展日趋精密和完善，諧声分析也在古音研究的各个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王念孙的分至部、祭部，江有诰的入声分配，钱大昕、曾运乾、章太炎、黄侃的古声纽研究等。继段玉裁之后，最杰出的古音学家是黄侃，黄侃建立了完整的周秦古音声韵调系统。黄侃把传统音韵学的考古和审音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古音学的发展在黄侃之后要想有重大的迈进已经不可能了，这

其实预示着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将迎来重大的转变。

为汉语音韵学注入新元素的是瑞典人高本汉。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二十世纪西方首屈一指的汉学家，著述等身的大学者。1915至1926年，高本汉完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一次用音标写下了《切韵》的韵类和声类的具体音值，改变了汉语音韵研究中只能通过汉字而进行部类讨论的传统。二十世纪初，欧洲正处于历史比较语言发展的尾声，高本汉把这种业已成熟的比较方法带到中国，同时也把汉语音韵研究带入了现代语言学的领域。高本汉于1915年26岁的时候，取得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一部分，在本书1926年最后出版前，高本汉于1923年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开始向上古音进行探索。此书的第一章探讨谐声字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的谐声原则，第一次对上古声母和辅音韵尾进行了探讨和构拟。这是汉语现代音韵学上第一篇探讨谐声理论的文献，他赋予了“同谐声者必同部”以全新的内容，因而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赵元任把它翻译出来，取名为《高本汉的谐声说》刊登在1927年的《国学论丛》第1卷上。此文根据喻母字的谐声行为，推测中古喻四的来源是上古声母 b-、d-、g-，恰和中古送气的 b'-、d'-、g'-，配套，这样就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同梵语一样的四件套塞音母：

p- p'- b- b'  
t- t'- d- d'  
k- k'- g- g'

他另外根据阴声韵和入声韵互谐的情况，又为上古汉语的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韵尾，同样形成了一个三件套的韵尾系列：

-b -p -m  
-d -t -n  
-g -k -ng

此外，他还根据不同声母字互谐的情况，探讨了复辅音声母的构成类型：

- <1>各 klak: 络 lak
- <2>各 kak: 络 klak
- <3>各 klak: 络 glak

这样一些工作都是开创性的。1928年高本汉发表《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1932 年发表《诗经研究》( *Shi-king Researches* ) ,1934 年又发表《汉语的词族》(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大体完成了上古汉语的构拟, 1940 年他把研究的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写下来, 这就是《汉文典》( *Grammata Serica* )。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中译本, 经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丁声树、董同龢、周殿福等中国现代一批最优秀的语言学家的努力工作, 得以在抗日的烽火中出版。

在热情推介高本汉学说的中国学者中, 有一位和高本汉一样受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 通晓欧洲各种古典语言, 掌握田野调查方法, 在上古音研究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那就是李方桂。李方桂 (1902-1987), 山西昔阳人, 1924 年赴美留学, 1926-1928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 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布龙菲尔德、伯克, 1928 年以《马佗里——一种阿塔巴斯堪语》( *Mattole, An Athabascan Language* ) 获得博士学位。李方桂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境内非汉语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上, 古汉语的研究是间断进行的, 分前后两个时期。1931 年至 1935 年他分别发表了《切韵 à 的来源》, 《东冬屋沃之上古音》( *Ancient Chinese -ung -uk, -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se* ), 《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 *Archaic Chinese \*-iwəng, \*-iwek and \*-iweg* )。此后一直到 1971 年, 李方桂一直没有关于上古音的专论发表, 但他在华盛顿大学一直讲授上古音, 1968 年李方桂在台湾大学做了 6 次上古音演讲, 这次演讲的讲义开始以油印本的方式流传开来, 李方桂才决定正式把自己对上古音的设想公诸于世。1971 年发表的《上古音研究》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 根据这个构拟大体上能写下整个古音体系而不致有太大的矛盾, 李氏有很多巧妙的设想, 如为幽部和宵部构拟了圆唇舌根韵尾:

幽: -əgw -əkw 中 -əngw

宵: -agw -akw

用以解释中古幽宵部字-u 韵尾的来源, 在幽部可以解释和之部 (-əg 、 ək) 的相近, 又空出了一个主元音的位置, 在冬部则避免了构拟 -ug、 -uk 这样的复合韵尾的麻烦。再如二等的 r 介音, 既可解释中古庄组 (tsr-, tshr, dzhr, sr-) , 知组 (tr-, thr-, dr-, nr-) 的来源, 又可解释二等韵的变迁。这样做的巧妙之处在于既能大大简化系统又能说明演变的条件, 就二等韵来说, 高本汉和董同龢是用不同的主元音表示的, 这些主元音就可取消了, 即如比较简明的王力的系统, 为二等设置了 e 和 o 两个介音, 这样既增多了介音 (王力系统有 6 个介音), 还不能很好解释